

诗学形而上学的 建构与解构



莫运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诗学形而上学的 建构与解构

● 莫运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学形而上学的建构与解构 / 莫运平著.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7

ISBN 978-7-5004-9191-0

I. ①诗… II. ①莫… III. ①诗歌—形而上学—文学
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I1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8386 号

策划编辑 冯 斌
责任编辑 丁玉灵
责任校对 郭 娟
封面设计 人文在线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244 千字

定 价 3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2008年6月，我随原佛山市市长梁绍棠、学校党委书记陈汝民等领导到香港拜访校董冼为坚先生，席间谈及近年内地的文化研究和人文科学的发展，先生兴致勃勃，谈锋甚健。席散之际，又约我们次日下午到位于士丹利街的陆羽茶室饮茶，继续谈文论道。我知道，冼先生身为万雅珠宝有限公司董事长，又是酒店、银行等多家大公司的股东，日理万机，惜时如金，实在不宜多扰。然而，待及握手言欢，促膝而坐，但觉春风习习，不禁流连忘返。先生前席相询，不遗凡庸，谦和热情，令人感佩不已。他向我详细询问了佛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状况，包括文科学者的构成，当前学术的重点，以及面临的困惑。他获悉学校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学者，还有一批青年才俊脱颖而出，在文学研究，特别是地方文化研究方面建树颇多，十分欣慰，当即表示，愿捐出一百万元人民币，资助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佛山地方文化研究。

作为一名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高校教师，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

算耐得住寂寞，并常以“无用之用，是为大用”自我宽慰，但我知道，“无用之用”的文学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难成“大用”。魏文帝《典论·论文》所谓“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不过是夸张之语，清代诗人黄景仁感叹的“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倒是普遍事实。当今世界，是一个急剧变化、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也是一个高度物质化的社会。置身注重实惠、讲究实用的时代，处在崇尚实际、追求实益的香港，著名实业家冼为坚先生却对人文科学、对文化事业如此重视，如此眷念，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后来我才知道，冼先生对人文社科研究的资助由来已久，且一以贯之。他曾多次慷慨解囊，资助香港中文大学、广州中山大学等高校的社科研究。正是鉴于人们对学术研究的支持多以自然科学为重，很少惠及社会科学，他才精心呵护人文领域的。这份热忱深深感动了我，令我倍感温暖。

回到学校，我向邹采荣校长汇报了香港之行的收获和感受，也向文学与艺术学院全体教师传达了冼先生的深情厚谊，闻者无不为之振奋，由衷感动。虽然，学院每年都能争取一些课题，获得一定的经费，但得到来自实业家的学术资助还是第一次！我们自能体悟这一百万元所包含的意义。它承载着先生对学术的敬重、激励和厚望！我们唯有加倍努力，以实绩报答先生。

文学与艺术学院拥有一支高效精干、特别能战斗的教师队伍，汇集了一批英才。中文、英语、艺术设计、工业设计等专业互相协作，高度融合，发展边缘学科，促进地方文化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以艺术设计系教师为主体的团队承担佛山“数字祖庙”项目，运用数字技术对古建筑加以保护，得到政府拨款495万元，这在文科学系中

是极为罕见的；工业设计专业开办十余年就获得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引起同行专家的关注；仅有24名教师的中文系10年间获得国家社科规划项目2项，教育部和广东省社科规划项目18项，每年发表论著60多篇（部），论文覆盖《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理论研究》等高档次刊物；大学英语教学部也多次获得教育部和广东省新世纪教育研究课题。由于学院充分发挥了学科交叉的优势，联合攻关，创出了科研的新路子。2009年还获广东省社科联批准建立我校第一个省级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广东省广府文化研究基地。

入选《佛山学者研究丛书》（第一辑）的著作，或为省级社科规划项目的结题成果，评级都在优良；或为优秀的博士论文，得到导师的高度评价和推荐。今后我们将本着宁缺毋滥、严肃认真的态度，继续编辑出版《佛山学者研究丛书》第二辑、第三辑，奉上本院教师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时，我们也希望得到学界同仁的批评指导。

李克和

2010年3月

前 言



马克思在谈到人类的生产时曾说道：“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① 也就是说，每一代的生产对于以前各代来说既有继承性，同时也有变更性；既有肯定，同时又有否定。精神生产也是如此。我们知道，精神生产最大的要求是独创性，不像一些物质生产活动可以进行纯粹的复制。而独创既不可能由内心苦思冥想而得，也不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88 页。

能是在完全推翻前人的思想成果的基础上进行，而是在前代既有的思想资料上进行合乎历史要求的新的建构。这种“新”与“既有”之间既有着继承，同时又有着否定，也就是说既是一种建构，同时又是一种解构。如卢卡奇在上世纪之初就指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具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对于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的本质。”^① 即马克思主义对于黑格尔既有着一种承继关系，但更本质的是又对之进行了改造，才成为一门独创性的学科。

不仅马克思主义，事实上，任何伟大的思想都同时兼具解构和建构两种姿态。从宽泛意义上来说，人类思维就同时包含着建构与解构的两个维度，而人类思想也就是在建构和解构中不断前进的。这是人类思维发展的一种普遍的矛盾现象。如黑格尔宣称矛盾是一切生命和运动的根源，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矛盾的原则统治世界，一切东西都会在矛盾中向它的对立面过渡。黑格尔用一个德文字 *aufgehoben*（扬弃）来表达这种思想。思维的演进也是如此。梯利在《西方哲学史》中用自己的语言描述了黑格尔的思维“正一反一合”的辩证发展过程：“一种思想必然从另外一种思想而来，一种思想激起一矛盾的思想，同这种矛盾的思想相结合而形成另一种思想。”^② 我们排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因素，可以看到，他确实把

①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第 77 页。

② 梯利：《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第 511 页。

握住了思想发展的根本特点。任何时代的思想都只能是在扬弃中进行，除此之外别无他途。任何时代的思想都是在克服（解构）前代思想的前提下的建构——尽管这种建构到了解构主义时期是以一解构的姿态出场的。

人类思维的上述特点在康德的批判哲学中表露无遗。康德说自己的纯粹理性批判“是对一般理性能力的批判，是就一切可以独立于任何经验而追求的知识来说的”^①，也就是说，他的批判哲学是“不与杂乱无边的理性对象打交道，而只与理性本身、只与从理性自身产生出来的课题打交道”，他所建构的批判哲学“完全不让任何在自身包含有某种经验性的东西的概念夹杂进来”，即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建构的是一种完全纯粹的先天的知识。^② 为完成这一目标，他认为在方法论上必须采取“纯粹理性的建筑术”：“我所理解的建筑术就是对于各种系统的艺术。因为系统的统一性就是使普通的知识首次成为科学，亦即使知识的一个单纯聚集成为一个系统的东西，所以建筑术就是对我们一般知识中的科学性的东西的学说，因而它必然是属于方法论的。”^③ 在这里，康德使用的“建筑术”（Architectonic）这一术语相当于英文中的“建构”（construct）一词。^④ 也就是说，康德的批判哲学是对“先天知识”的一种建构。而且这

①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② 同上书，第17、21页。

③ 同上书，第629页。

④ 《纯粹理性批判》的英译者 J. M. D. Meiklejohn 是这样翻译康德上段引文中的第一句话“By the term Architectonic I mean the art of constructing a system”。见英译本，伦敦，1991年版，第471页。

种建构在他看来是理性自身的一种能力。

那么，康德的批判哲学的建构是否就是纯粹的建构，而并不包含解构的因素？在此我们不能以康德没有使用“解构”这一术语，就作一简单的否定的回答。术语的使用并不是关键。如同对解构主义来说，并不因传统形而上学不使用“解构”一词就否定形而上学内部有着自我解构性。事实上，在海德格尔那里，Reduction（还原）、Kostruction（建构）与 Destruction（解构）被认为是现象学方法的三个基本环节，其中，Destruction 的内涵主要是对传统存在论的历史的批判性分析。海德格尔的批判精神从精神史角度来说应该是继承了康德的批判哲学精神的。而从康德本人的意图，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批判哲学的前提就是要对此前的形而上学的伪科学性进行解构。他说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就是要“着手进行一场形而上学的完全革命来改变形而上学迄今的处理方式”^①，这一革命针对着康德所指责的独断论和怀疑论。因此，康德的批判哲学的建构是在对独断论和怀疑论的解构的基础上展开的。

康德尽管在哲学领域里发动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但在力图建构一个包罗万象的宏大理论（grand theories）体系方面算得上是传统形而上学的代表。它虽然包含着解构的要素，但解构并非其理论追求的目标。这一点与康德说的人类追求形而上学的痼癖有着很深的关系。这种形而上学的努力遭到了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传统形而上学的宏大理论是人为构造出来的，人们同样可以推毁（解构）它们。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主要目标便是对

①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8 页。

传统形而上学的拆毁、解构和否定。但是，这也只是后现代主义的一面而已。在解构的同时，后现代主义还有着建设性的向度。如倡导创造性、对世界的关爱以及鼓励多元思维模式。即后现代主义其实也是在解构与建构之间活动的“游刃于两种对立之间的人”（罗蒂语）。^①而后现代主义游刃于解构与建构之间，在本质上属于人类的一种思维的方式。我国专治后现代哲学的学者王治河就主张将后现代哲学作为思维方式来对待。他认为：“后现代哲学的推毁一切同时就暗含着保留一切、恢复一切、建设一切的意思。”^②在美国学者格里芬所区分的后现代哲学的两种类型中——偏重解构与偏重建构——其实也只是偏重不同。它们都有着建构与解构的双重因素。

此前言无意对哲学史的建构与解构进行条分缕析。我们只想通过上述描述指出，建构与解构其实不像解构主义者所说的只是“文本”的内在矛盾。我们认为，建构与解构是人类思维中共在与共生的两个维度。

—

建构与解构既然是人类思维中的普遍现象，这给我们切入诗学

① 王治河：《后现代主义的建设性向度及其依据》，见格里芬《超越解构》代译序，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② 王治河：《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后现代哲学》，载《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一个很好的角度。因为一部诗学史其实就是一部诗学观念不断建构和解构的历史。

首先，“诗学”观念本身在不断遭到建构和解构。“诗学”一词在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不同的诠释，至今还没有获得一个十分确切的含义。法国学者达维德·方丹在《诗学》一书中就列举了瓦莱里、雅各布森、热奈特等人对诗学所下的不同定义。我们可以说，从古希腊将诗学更多地视为是“诗艺”，到瓦莱里将诗学定义为文学的内部原理，到雅各布森把诗学的研究定位于文学性，以及热奈特作为对各种可能的文学阅读进行的探索，“诗学”观念就在不断地被更新。^①“诗学”观念的含混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本书研究诗学的阻碍，我们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诗学”定义。本书也只能在非常宽泛的意义上来谈论“诗学”这个字眼，以之指称有关文学（诗）的一切学说。

其次，诗学史上诗学论域的转换原因复杂，包括文学的、哲学的、政治的、心理的以及宗教等原因，但就诗学自身来说，“转换”就是在解构前代诗学基础上的一种新的建构。不同理论家对诗学的发展阶段或各种理论曾作过不同归纳。如方丹将西方诗学史分为了四大阶段：“模仿诗学，主要研究作品与其所呈现的社会景象（公元前4世纪—公元后16世纪）；实效诗学或叫接受诗学，注重作品在读者心里产生的效果（17—18世纪）；表达诗学，看重作者及其特殊才能（18—19世纪）；最后是客体诗学，或称形式诗学，把作

^① 达维德·方丹：《诗学：文学形式通论》“引言”，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品或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作为研究对象（20 世纪）。"^① 而艾布拉姆斯则在《镜与灯》中提出文学四要素（世界、作品、艺术家、欣赏者）时，认为不同的批评家往往只是根据其中的一个要素，就生发出他用来界定、划分和剖析艺术作品的主要范畴，生发出借以评判作品价值的主要标准。因此各种不同的文学理论可以分为摹仿说、实用说、表现说及客观说四种，这些理论在历史上有一个演进的过程，“先是模仿说，由柏拉图首创，到亚里士多德已做了一些修改；继而是实用说，它始于古希腊罗马时期修辞学写作诗法的合并，一直延续到几乎整个 18 世纪；再到英国浪漫主义批评（以及较早的德国）的表现说”。^② 而《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的选编者拉曼·塞尔登则将雅各布森的语言交流理论用于文学理论的区分。认为在批评史中，“有些批评话语采取了作者的观点，另外一些批评话语则探讨读者或听众对作品意义所作的贡献。还有一些批评话语集中研究作品本身，将印在书页上的文字看做一个自足的实体。结构主义者则力图发现潜藏在某类特别‘信息’下的符码，最后，还有人认为文学批评主要的研究对象应该集中在作品的历史语境上”。塞尔登还提出了一个我们在面对这些互不相容的理论时所可采取的方法：“我们可以把不同批评传统的存在解释为一个各自为确立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无休止地争斗的过程，也可以把它解释成为建立文学过程的知识体系的一系列努力，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这看

① 达维德·方丹：《诗学：文学形式通论》“引言”，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 页。

② M. H. 艾布拉姆斯：《镜与灯》，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6 页。

法是同时成立的。”^① 用本书的语言来说，就是我们要将诗学史的种种理论解释为同时在进行建构与解构的理论，既有与他者的争斗（解构），也有自身理论的建构。

再次，从古希腊至后现代主义，诗学史可以简约为从形而上学基础上的建构走向对形而上学的解构的历史。诗学虽然同时包含建构和解构的双重因素，但是在不同时期对建构和解构有着各自的侧重。大体来说，从柏拉图至黑格尔，西方诗学是侧重于从形而上学的基点上出发进行建构。而至德里达，则偏向于对形而上学的解构。这一划分非常粗略，但合乎德里达说的西方哲学从柏拉图至海德格尔的历史是形而上学史的断言。而形而上学的明显特点就是要在某一基础上建构一个宏大理论体系。像康德说的“这个世界上一直都有某种形而上学存在”^② 一直是传统哲学和诗学所深信不疑的，诗学是自觉或非自觉地在形而上学中建构自身的理论体系。而从德里达始，“解构”上升为一种主要的理论方法，延伸为一股解构主义的思潮。解构诗学也由此而以“解构”二字标划出了与传统诗学的界限。当然，德里达的断言有其武断的一面，因为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方法中就已经包含了自觉的现象学的拆毁（Destruction）这一环节。后期海德格尔的“思”与传统哲学也有了本质的距离。因此，本书只是大致遵循这种划分，并不将后期海德格尔纳入传统形而上学之列。而是希望在经过解构主义洗刷后，用海德格尔的资源重构一种生存论诗学。

① 拉曼·塞尔登：《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②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三

笔者之所以选取西方诗学形而上学的建构与解构作为论题，从理论层面来说，这是诗学自身的要求。有什么样的对象就应该有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就诗学的研究来说，现在虽然是解构之风日盛，但是如果将诗学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则还应有一个对建构与解构研究的大全的视野。当然，更主要的是，对诗学形而上学的建构与解构的研究是一个已被学界提上议程的迫切的课题。如我国当今文学理论应该走向创新，在以往的文学理论基础上进行一种适合时代需要的重构，这是文学理论界公认的使命。但是，我国在引入西方诗学时，往往对西方诗学建构的前逻辑及解构的内在机制追究不充分，因此在建构自身的诗学时往往重经验而思辨不足，即对西方诗学的形而上学的规定认识不够；而在解构时又往往批判有余而吸收不足，即只注重以西方诗学的现成结论来批判和解构本国的理论，而不注重在批判的同时进行重构。所以，著名学者季羨林先生指出：“反观我们东方国家，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在近现代没有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王国维也许是一个例外。没有一本文艺理论著作传入西方，起了影响，引起轰动。”^①

那么文艺理论应该如何走向创新呢？有学者提出了：“文艺理

^① 季羨林：《东方文论选·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论的发展取决于文艺基础理论研究的突破，取决于基础理论问题的局部突破带动学理的整体建构。因而，当前的文论研究应该倡导回归本体，而不是解决外围；回到问题，而不是制造概念或急于搭建体系；回到起点、找准支点以解决基础理论命题，而不是凌空蹈虚或避坑落井。”就是说，“首先是要回到基础理论本体，以‘元问题’研究来启动文艺学当代形态构建”。^①

至于文学理论应如何创新，学界认为有两种思路：“一种是不少学者所主张的走综合创造的建构之路，即充分吸纳中外古今的各种理论资源，尤其是整合新时期以来我们的理论突破和探索创新的既有成果，进行综合创造，建构具有广泛的涵盖面和广阔的阐释空间的文学理论系统。”“另一种思路则认为，要想建构一种综合众说、涵盖古今中外、包罗万象和包打天下的文学理论，其实仅是一种良好的愿望，是一种幻想，是不大可能实现的。比较现实的建构之路，还是应当鼓励各具独立的理论立场，自创新说，成一家之论。”但是，对于两种思路来说，都存在一个寻根的问题。对于前一思路来说，“我们要能够找到有可能进行这种有机综合或整合的共同的理论基础，就是说要能够找到所要综合的各种理论都可以彼此通约的共同的理论立场和逻辑起点，也就是一切都要能够归结到一个共同的理论根基上，否则就仍将是一种悬浮状态的、无根状态的、非结构状态的综合”。而对于后一思路来说，同样有一个往理论根基上追问和追寻的问题，“其实多年来创立新说的也并不鲜见，但往往少有公认者，原因之一可能也正在于在理论根基上未自觉追

① 赖大仁：《当代文论创新建构中的几个问题》，载《文艺报》2001年7月13日。

问或是未能深入下去，以至于还是处于悬浮状态”。^① 也就是说，文论诗学的创新无论走的是哪一条道路，都有着—个理论寻根的问题。而理论寻根其实就是澄清理论的思想前提，文艺理论如果不首先解决自身的思想前提，那么在理论的发展与创新过程中必然会陷入—片混乱。笔者的博士生导师王元骧先生—直在“探寻综合创造之路”，据他分析，我国五四以来的文学理论尽管基本道路是正确的，但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时候，缺乏对历史传统作全面而科学的研究和分析，以批判继承的态度进行对待；因而使得我们的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往往从—个片面而走向另—个片面，不能形成具有我们自己特色的一以贯之的理论传统”。而之所以这样，关键的一个原因在于“在不同程度上受了西方近代哲学中曾经流传—时的知性的思维方法的影响。这种思维方式已由哲学引入到文学理论研究之中，使得西方近代许多文学理论家都不是从总体出发，而习惯于把文学分解开来，孤立地从某—层面、某—视角出发进行考察，因此就很难达到对文学作全面而完整的把握”。^② 依笔者之见，我们之所以对西方理论缺乏分辨，无法做—全面的掌握，更关键的是缺少对西方理论的理论前提的研究。西方文学理论是形而上学之下的理论，我们的接受往往是忽视了其理论前提下的接受，在应用到中国文学实践的时候就会出现种种的问题。可见，创新的首要任务就是先厘清理论的前提。我们要吸取西方诗学的资源，首要前提是对建构与解构的内在机制进行分析。总之，“跨世纪的学术文化研究，

① 欧阳友权：《面向 21 世纪的文艺基础理论》，载《中南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 年第 4 期。

② 王元骧：《文学理论与当今时代》，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93 页。